



20世紀
台灣文學專題 I:

文學思潮與論戰

主編 陳大為 鍾怡雯

1915

1924

1930

1941

1945

1949

20世紀台灣文學專題 I

1950

1956

1969

1972

1973

1977

1978

1987

200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20 世紀台灣文學專題 I：文學思潮與論戰 / 陳大為, 鍾怡雯主編. -- 初版. -- 台北市：萬卷樓, 2006[民 95]

面： 公分

ISBN 978 - 957 - 739 - 569 - 6 (平裝)

1. 台灣文學 - 歷史 - 論文, 講詞等

850.32907

95015662

20 世紀台灣文學專題 I：文學思潮與論戰

主 編：陳大為、鍾怡雯

發 行 人：許素真

出 版 者：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

電話(02)23216565 · 23952992

傳真(02)23944113

劃撥帳號 15624015

出版登記證：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

網 址：<http://www.wanjuan.com.tw>

E - mail：wanjuan@tpts5.seed.net.tw

承印廠商：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定 價：340 元

出版日期：2006 年 9 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謝謝)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13：978 - 957 - 739 - 569 - 6

ISBN-10：957 - 739 - 569 - 4

—— 目 錄 ——

日據時期：1915-1945

- 002 黃美娥 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
- 042 向 陽 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
- 068 劉紀蕙 從「不同」到「同一」：台灣皇民主體之「心」的改造
- 112 崔末順 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文學運動的形成與發展

反共文藝：1950-1956

- 138 應鳳凰 五〇年代文藝雜誌與台灣文學主潮
- 158 王德威 一種逝去的文學？——反共小說新論

新詩論戰：1956-1969

- 174 蕭 蕭 五〇年代新詩論戰述評
- 192 劉正忠 主知·超現實·現代派運動：台灣，1956-1969

現代詩論戰：1972-1973

- 222 李豐楙 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前後新詩社的興起及其
意義——兼論相關的一些現代詩評論
- 242 李癸雲 詩和現實的理想距離——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
台灣現代詩論戰的再檢討

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

- 268 呂正惠 七、八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的源流與變遷——政
治、社會及思想背景的探討
- 282 許琇禎 從民族、寫實到本土——台灣「鄉土文學」之歷
史考察與評析

從後現代到後殖民：1987-2000

- 308 邱貴芬 「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
- 326 陳芳明 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 348 廖炳惠 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
- 364 編後記

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

台灣話文論爭

皇民主體

左翼文學

五〇年代文藝雜誌

反共小說

1915—文學思潮與論戰

新詩論戰

現代派運動

詩社的興起

現代詩論戰

鄉土文學

從民族寫實到本土

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

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

後現代或後殖民

黃美娥

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對立與協力：

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
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

一、前言

回顧世界文化發展，在新舊思想、文化更迭時，常會出現語言文字的重大變革，如歐洲的文藝復興以及日本明治維新；而中國也有近似的情況，一九一七年的白話文運動便提倡以平民的白話代替傳統的文言，逐而引發了新舊文學雙方的對峙與論辯。當時的中國，由於政府教育政策的訂定，白話的傳播迅速獲得確立與保障，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間白話成爲國語；儘管次年南京《學衡》雜誌尚有梅光迪等人的批判，但胡適以爲此時的議論僅是文學革命的尾聲，新文學的發展實際已完全進入到創造時期。相較於中國白話文運動在短短幾年便能推展順利，台灣則是歷經漫長的鏖戰，最終要到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後，白話文才取得絕對的優勢。而在日治時期的台灣，由於日文才是官方語文，當時的白話或文言漢文其實都無法取得主流的優勢地位；因此，本地所發生的白話與文言漢文的交鋒競爭，以及新舊文學的論戰，便衍生出與中國不同的面目。事實上，台灣的這段文學歷程，遠比中國複雜許多。

關於這場發生於漢文文學界的文白語言之爭¹、新舊文學的較勁，在台灣一般統稱之爲「新舊文學論戰」（1924-1942）²，由於歷時甚久，爲

¹ 日治時代台灣新文學的創作，主要有兩種書寫系統，一以日文寫作，二採北京話文寫作，後者在三〇年代又出現嘗試以台灣話文來寫作。其中，日文對於台人而言乃是新生的語言，自無新與舊之分，因此所謂新舊文學論戰，僅發生在漢文學界上。

² 所謂「新舊文學論戰」，狹義而言，當指新舊文人雙方在短期內有過一定數量的文字激辯，較能以論戰視之，如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張我軍與舊文人間的交鋒、一九二九年葉榮鐘與江肖梅的爭辯、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間林荆南與鄭坤五的論戰；廣義而言，則泛指一切新舊文人對此議題所發表的相關意見與活動，涵蓋一九二四至一九四二年零星而未集中於某一階段所出現的言論；至於本文的論述，主要以狹義論戰爲分析主軸，不過實際觀察範圍多少也會涉及廣義範疇，

便於觀察其中文學場域的變化，筆者考量了雙方於論戰發生後的對立與協力情形，擬區分為三期來加以說明，而這三期恰與二〇、三〇、四〇年代相當。這場論戰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上的大事，因為它造就了台灣新文學生成的契機與茁壯的可能，改變了過往舊文學一枝獨秀的局面。對此，歷來研究者雖多，但卻存有兩項盲點，其一是從「新文學」的立場出發，論述其間的過程或結果，對於舊文人及其表現往往給予負面評價，未能真正掌握舊文人的處境與心態；其二則是未對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二年的論戰作歷時性的考察，而慣以二〇年代的論戰情況等同於全部的論戰過程，遂無法明瞭當時新舊文人在論戰爆發後十餘年間肆應反省的情形。以目前台灣學界經常引用廖漢臣於一九五四年在《台北文物》所發表的〈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來看，該文對於論戰提出如斯的觀察與結論：

「新舊文學的論爭」……籠統的說，可謂前者提倡的是種幫閒的文學，後者提倡的是種民族革命的文學。……台灣新文學運動，不但沒有受到日政府的支持，而且不斷受著日政府的壓迫或舊文人的阻擾而踟躕於建設途中……，在理論上，早就見到高低，但實際上新文學自始至終，終不能打垮舊文學，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舊文學陣營，雖然受不了新時代洪流的衝擊，內部自行開始分化了，但是有日政府的庇護——因為日政府要利用舊詩人，來愚化本省青年，將舊詩人的活動，採用寬大的政策——還得抱殘守缺，苟延餘喘到本省光復前夜。

這段文字，既在本質上強烈區分新、舊文學的不同，深化彼此的對立；又強調新舊文學論戰勝負懸殊的結果，同時批判舊文學家與日政府間的

故在時間上標示為一九二四～一九四二年。

共謀關係，因此相當程度地浮現出舊文學的不堪及舊文人「文學技藝不如人，又乏民族意識」的卑劣形象。由於廖氏曾經親身參與論戰，其文流衍所及，便儼然形塑了日治時期台灣舊文學與傳統文人的刻板印記。

類似的思考模式，在近年兩岸所見的數本台灣文學史中仍不斷重述，書中的記載也往往以新文學普獲勝利、舊文學全面挫敗作結。而論者在評斷此一論戰時，更多半認同新文學家的立場與意見，甚至複製了昔日的隆隆砲聲，如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逕用「舊文學的破產」為題，對此加以剖析：

動了肝火的新舊文學論爭裡，……在情緒化的罵詞背後，舊文學與時代脫節，和現實人生不具備一致的脈跳，以及對世界文藝思潮的懵然無知，則是無法洗脫的罪狀。舊文學為自己所做的辯駁，薄弱而可笑，……暴露了舊文學是文學「門外漢」……。進入二〇年代以後，舊文學的一面倒，凸顯了新文學運動的意義，絕不僅是使用文字上文言、白話的差異，而是文學功能、價值，與文學任務、職責的天壤之別。（1991，頁2）

以上的鋪陳，不僅遙應日治時期新文學家的靈魂，無寧也再現了廖氏的看法，其中更隱含著一種新文學家在論戰後獲得全面勝利，舊文學陣營則節節敗退，逐漸淡出台灣文學的場域，甚至失去提升台灣文學動力的朦朧論述。這樣的說法，極易引發讀者一種推測與聯想，彷彿日治時代台灣文學的發展重任全由新文學家獨立扛起，舊文人在論戰後，成了無關緊要的道具角色，甚或是本島文學進步的阻礙。

實際上，當吾人回首從前，固然在新舊文學論戰中，代表新文學的一方，最終打破了長期以來舊文學獨霸的局面，但舊文學依然有著一定的生存空間與勢力，否則新舊文學論戰無庸從二〇年代延續至四〇年代而難以休止，何況廖氏在前揭文中也自承「新文學自始至終不能打垮舊

文學」，這更說明了台灣文學史在一九二〇年代新舊文學論戰後的文壇中，舊文學依舊活動不斷，值得在文學史中繼續予以交代，而不能單單冠以「破產」一詞後，便告銷聲匿跡。另外，一九三七年報章漢文欄廢除後，舊文學不需從衰微中復甦、振作、再興，便能「迅速」奪回文學舞台的發聲權，雖然有謂此係日本政府刻意維護的緣故，但是倘若原本已經衰微的文藝創作，要在片刻之間復甦談何容易？甚至同時期若干新文學家，如賴和、楊守愚……等素重民族氣節者，願意選擇組織「應社」³、撰寫舊詩以言志，而未因舊詩與日政府間的曖昧共生關係而唾棄，似又可見廖氏對於寫作舊文學者必與日政府沆瀣一氣的影射太過武斷。如此說來，重新評估、省思此一論戰的必要性，不言可喻。

因此，有別於目前的台灣文學史皆從新文學角度評價論戰的書寫方式，筆者擬由舊文人的立場出發，除了嘗試釐析此一論戰的主要糾葛外，也企圖掌握舊文人在論戰發生後的應變與思索。至於雙方爭辯的過程，由於相關討論已多，且論戰始末的資料也已有所整理⁴，故本文不予重

³ 該社成立於一九三九年，由賴和、陳虛谷、楊守愚、楊笑儂……等九人合組，社名有「同聲相應」之意，而賴和在〈應社招集趣意書〉中談及該社之創主要在於「講求吟詩的趣味，琢勵詩人的節操」，可見賴和對於漢詩社仍然是有所期待與寄託的。賴文參見《賴和全集·雜卷》（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109。

⁴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古典詩壇的影響〉，見氏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229-269；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文載《台灣文學學報》第二期，頁33-65，2001，已將論戰資料條列說明或列表整理，只是二者皆乏1941至1942年的論戰資料，拙文〈醒來吧！我們的文壇——再議1941至1942年間台灣新舊文學論戰〉已補齊此一不足處，文章原發表於2002.3「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學會議」，後收入東海大學中文系編《日治時期台灣傳統文學論文集》（台北：交津出版社，2003.2），頁322-頁359。另，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輔仁大學中研所博士論文，2002.7）文末「附錄」亦有詳細整理，頁336-371。

述，而改從論戰背後深層結構中文學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介入，因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興起本就是文化抗日運動的一環，歷來的論述者也多肯定其所蘊含的新文化精神，因此在探析論戰中舊文學及舊文人的相關問題時，同樣地也應置放於文化的脈絡下思考，兩相參照，方能凸顯雙方的立場與用心。又，新舊文學論戰，本就是文學上的新、舊典律（canon）之爭，因此文學問題的探討自不能免，職是之故，本文便以典律反省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思維為論述主軸來加以說明，重構雙方在文壇中面對日本殖民帝國政治／文化的強勢威脅下所產生的複雜關係，進而尋找在歷來所謂新、舊文學彼此對立的詮釋下，是否存有協力的空間？同時也重新思考舊文學／舊文人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中的位置與角色。

二、論戰前傳統文人的文學改造

（一）

從一九二〇年七月《台灣青年》創刊，到張我軍一九二四年四月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這一段醞釀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前夕，目前可知的已有陳炳、甘文芳、陳端明、潤徽生、黃呈聰、黃朝琴……等人，相繼在《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上發表文學與社會關係的言論，他們相當一致地將文學放在社會文化層面上來思考，並肯定唯有白話文的新時代文學才能擔負起社會革新的責任；這樣的定位，已充分顯現出台灣新文學運動一開始便是文化革新下的產物。

其中，陳炳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二日 1 卷 1 號《台灣青年》發表的〈文學與職務〉便是首篇對此加以探討的文獻，依其陳述，新、舊文學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已經隱含了疏密關係。另外，秀潮（即許乃昌）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 1 卷 4 號《台灣民報》上，發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他在引介中國新文學運動概況之前，首先抨擊台

灣在文化上有其弊端，那就是「守舊性」，因守舊性格而沒有進化觀念，強烈暗示此一現象恐會導致新文學推動的不利。所以，潤徽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1 卷 14 號《台灣民報》刊登的〈論文學〉一文，就指出了當時的台灣仍以舊文學為主流，甚且還有獎勵之風，白話文提倡初期阻力甚大；但即使如此，作者卻已預言新、舊文學必然相抗爭，且勸說舊文學者莫要因為舊文學的價值遭受質疑而反對新文學的推廣。此舉彷彿預告了新舊文學論戰即將開啓，果然，短短四個月之後，張我軍便透過《台灣民報》引爆了雙方熱烈的論戰。

一如論戰之前，台灣知識份子已將文學與文化議題相互連結討論，而由張我軍於一九二四年所激起的新舊文學論戰，關於其言論，彭小妍有著精要的剖陳：

在他的詮釋下，舊文學和新文學代表了兩種階級的對立。他詬病「古典文學」代表「陳腐衰頹」，舊詩已淪為「遊戲」、「器具」、「詩玩」，除了排遣酸氣以外，就是乞求「總督大人」的秋波。換句話說，他點名批判的「詩伯」、「詩翁」之流，和殖民者互通聲氣，儼然形成一班「自以為儒文典雅」的階級。就張我軍而言，這批詩伯詩翁更大的罪惡是養成沽名釣譽的「惡習」，戕害了「活活潑潑的青年」。也就是說，舊詩是台灣人自甘奴隸性格的象徵，而新文學才能改造台灣人的奴性，讓青年展現改革社會的活力和清新性格，台灣社會才有光明。於是在張我軍的文論中，舊文學／新文學、附庸殖民者／創造台灣光明社會、劣等國民性／優等國民性的劃分對立於焉成立⁵。

透過彭文的分析，可以發現張我軍的思維模式，其實也是出自於一種文

⁵ 參見彭小妍〈文學典律、種族階級與鄉土書寫——張我軍與台灣新文學的起源〉，文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八期，1996年3月，頁6。

化視角，與前述諸人有著一脈相承的看法，他們共同以為舊文人／舊文學是時代的落伍者，舊文人有著劣等國民性，更甚者則是張氏在點出舊文人是享有某些優勢的特權階級之後，特別著力於批判舊文人／舊文學與殖民政府間的暗通款曲，這也進一步牽動了敏感的國族認同問題。

綜上可知，不管是在論戰前或論戰後，新文學一方的知識份子，在看待舊文學／舊文人時，都已或隱或顯地流露出張我軍式的二元對立思考。但吾人要問的是，自乙未割台至一九二〇年代，長達二十餘年的時間裡，舊文人如何看待並面對新的文化衝擊以及日漸成形的現代化社會？對於「新」的社會難道他們都是無知無感，而不曾思索舊文學在新時代中的作用？

(二)

在目前的研究中，已有學者注意到舊文學在尚未發生論戰前，其實已經出現過改革的呼聲，如連雅堂倡議台灣詩界革命論，其對詩界主要的不滿是在擊鉢吟，他認為「擊鉢吟者，一種之遊戲也，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績，僅成土苴，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誦。」(《台灣詩薈》19號)此外，也針對「學詩者讀書太少，作詩者言不由衷，尤其是詩人人品」提出反省的呼籲⁶。

除了台灣詩界革命論外，筆者擬再提出其他舊文人處於新時代下的文學革新言論，進以釐析張我軍所謂：「……台灣的詩文等從不見過真正有文學價值的且又不思改革，只在糞堆裡滾來滾去，滾到百年千年也只是滾得一身臭糞。……⁷」、「像台灣那般小小的島，……這幾十年來，日

⁶ 以上是施懿琳剖析連橫有關舊詩反省的言論而歸納之結果，同註4，頁258。

⁷ 參見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寫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廿六日，原載《台灣民報》2卷7號1924年4月21日，收入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台海出版社，2000)，頁3-4。

本文學界猛戰的砲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戰士的吼，都不能打動這挾在其間的小島，……，沒有一些活氣，與現代的世界文壇如隔在另一個世界似的，這是多麼可痛的事啊！」其所詬病的台灣舊文學弊端是否吻合台灣文壇的實況？

1.

一九一五年九月，時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也是台北瀛社重要社員的魏清德，轉往福建《閩報》任職，因為在閩既久，見聞遂廣，次年發表〈旅閩雜感〉以誌所得，言及當時閩省文學的情形：

閩省文學分新舊兩派，……大抵年少人士攻新學者，類多於固有國粹，文義鮮通，而罷官去職一班不得志之徒黨，顧影自穢，甚至以作詩為莫大之恥辱者，同一新聞紙上論據，與其尊堯而述舜，不如談美而稱歐，號稱進步優為讀者所稱誦焉。……廁聞國家民族之隆替，關於文運之盛衰。……支那交通不便，其語言未能統一，例如榕垣省會之用語，與閩省地方用語不同，文字雖不普及，舉國通用，文字者有形無聲之語言也，文字為世界的應時勢之要求，則國民思想亦世界的應時勢之要求，文字卑鄙頭巾則國民思想亦卑鄙頭巾，龍門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惟大文豪為能積健為雄，興文字革命之師，作輿論之指歸者，又其誰乎？蓋改良支那目下之急務也。⁸

此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白話文運動爆發之前，從文中看來，魏清德似乎對

⁸ 參見張我軍〈糟糕的台灣文學界〉，寫於一九二四年四月廿六日，原載《台灣民報》2卷24號1924年11月21日，收入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同上註，頁6。

⁹ 參見潤庵生〈旅閩雜感〉十三，文載《台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2月16日，第5617號。

喜歡「談美稱歐」的新派有所不滿，並給予批判，但魏氏並非故步自封之人，在文末他提出了閩省文學興革的急務，他以為當時支那語言雖不一，但至少文字是能彼此溝通的，所以更形重要，而文字須能應世界時勢之要求，如此透過文字的傳播刺激與影響作用，國民思想也就能達成順應世界時勢的目標。顯然，依照魏清德的認知，舊文學也能與世界時勢同步，且舊文學也必須要能順應世界局勢，也就是說，在白話文這種語、文一致的「新文學典律」尚未被推崇為改造國民思想的最佳利器之前，舊文人／舊文學其實早已處於新文化／新世界的氛圍中了，並且有感外在的新變，而力圖革新以應世界時勢的要求。

福建文學的情形如此，那麼台灣本島呢？在魏清德的觀察中：「二十年前台灣社會之組織，文物衣冠之制度，依然為閩省分身，而今已矣，浩浩蕩蕩，世界文明之思想潮流，若促吾台進步，濡染刺戟，曾幾何時，而舊時之固陋，淘汰半盡，此吾人之所賀也。」¹⁰昔日台灣的一切，皆屬閩省的分身，但現在的台灣已能進與世界文明的思想潮流接觸，並將從前的固陋汰除殆盡，達到大大的進步。在上列的敘述中，台灣隱然有著遠離祖國支那而與世界接軌的意涵，魏氏甚至暗示這正是台灣進步的關鍵所在。既然台灣在現代世界文明思潮中，已經能夠大步邁進，努力追求，那台灣的文學又當如何順應於世界潮流呢？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魏氏仍在台灣時，曾經發表一場題為「詩及國民性」的演講，而後又將演講內容摘要刊登於《台灣日日新報》上以廣為週知，略謂：

國民性之消長，詩亦與之消長。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敷島の

¹⁰ 語見潤庵生〈旅閩雜感〉十五，文載《台灣日日新報》，大正5年2月19日，第5620號。

大和心を人間はば朝日に匂ふ山櫻花)此詩具有日本國民性之表見，漢詩數千年作者不少，可惜無國民性表見之詩。此後所宜改良者，為排去陳腐，應時勢之要求，詩之本領，不獨為精神界之慰安，將以高尚國民之品性，改造國民之精神，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內地人之格言，余亦深贊成其說……¹¹。

以上言論與其日後批評福建文學時(如前引〈旅閩雜感〉十五)，思考大致相近，皆認為詩歌具有改造國民性的作用，從事文學創作的人，要以能在詩中呈現國民性為要務，進而高尚國民性，改造國民精神。如此看來，舊文人無寧對於自身的文學，仍是寄予厚望的，而魏清德在文中引用日本格言「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更可見其改革心意。此一深盼舊詩能夠成為改造「國民性」利器的理念，與新文學家要以白話文的新文學來啓蒙大眾，提升百姓趕上現代化社會，其實並無二致。果如此，就不難窺知舊文人在論戰中與新文學家，對於「文學典律」之爭奪，何以如此激烈？因為在舊文人的心中，舊文學典律本也能發揮啓蒙作用，何必非要白話文文學才可以呢¹²？

由此可知，在中國白話文運動尚未興起，亦即台灣未受此一風潮影響之前，台灣本地的舊文人早已在尋思舊文學在新時代中的定位與角色。

2.

除了上述舊文人的個別看法外，論戰前夕，台灣恰有兩份詩刊發行，其一是連橫的《台灣詩薈》(1924.2-1925.10)，另一則係台北星社同仁黃

¹¹ 文載《台灣日日新報》，大正4年7月8日，第5405號。

¹² 只是，較為曖昧的是，誠如魏清德在演講中援引日人的詩歌及格言以證成己見，此舉已然浮顯了舊文人在追求台灣國民性及文學改造的同時，可能會出現與日人靠攏、親近的論述，日後甚至有些舊文人會有向日本文化取法、看齊的言論，箇中現象值得進一步探討。